

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及其对 全球安全格局的影响^{*}

□ 王高阳 刘辞源

〔提 要〕从伊拉克战争到乌克兰危机，私营军事公司深度参与地缘政治冲突，其服务广泛覆盖军事安保与作战、战场情报、军事训练及军备供给等，成为安全事务的重要参与者。私营军事公司为主权国家传统军事力量提供了重要补充，重塑了战争与安全的逻辑。通过提供精准的安保服务、高效的资源整合能力以及现代技术驱动的作战模式等，私营军事公司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及“灰色地带”冲突提供新路径。同时，私营军事公司以其市场化机制解构传统的国家军事垄断、军事行动的逐利性逾越战争发起的正当性、资本逻辑消融国家主体性权威，对全球安全格局造成范式性冲击。展望未来，全球安全市场对私营军事公司的需求将继续存在，与之配套的规范建构与制度性约束也将陆续开展；同时，私营军事公司对国家的反噬风险仍存，竞争力亦有可能被新一轮科技革命所重构。

〔关 键 词〕私营军事公司、全球安全格局、军事私营化、安全治理

〔作者简介〕王高阳，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郑州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

刘辞源，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E159, 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5) 4 期 0107-23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身联网的国家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1CGJ046）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资助。

有悖于“暴力只能被主权国家合法使用”的大众认知，自14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暴力便开始走向平民化、市场化和国际化。^[1]作为非国家暴力的一种重要形式，雇用外国士兵为本国作战和“战争”自身的历史一样悠久。从古埃及到维多利亚时期的大英帝国，历史上几乎每个帝国都毫不例外地雇用外国军队。^[2]然而，现代意义上的雇佣兵与其中世纪的“前辈”们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他们专业、高度组织化、训练有素，是精通商业运作并且涉足一些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如石油和采矿的商人。^[3]历经数百年的演变，“雇佣兵”已发展为私营军事公司^[4]这一具有高度组织化、体系化、专业化的成熟形式，不仅改变了国际政治和现代战争的规则，而且对国家主权、军事行动以及国际法的理解和应用提出了新的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起，私营军事公司便积极在冷战后全球格局转换阶段的军事冲突地区拓展业务。^[5]资料显示，自1994年到2002年，美国国防部与12家美国私营军事公司签订了3061份合同，估值超过3000亿美元，^[6]有

[1] Thomson J E, *Mercenaries, Pirates, and Sovereigns: State-building and Extraterritorial Viol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

[2] P.W. 辛格：《企业武士：私营军事产业的兴起》，刘波、张爱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3] Seden Akcinaroglu and Elizabeth Radziszewski,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Opportunities, and Termination of Civil Wars in Afric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7, No.5, 2013, pp.795-821.

[4] 一般意义上，私营军事公司（Private Military Company）是指以商业形式提供武装战斗或保安服务的公司；私营安保公司（Private Security Company）则是以市场方式提供预防性安全保障服务的私营企业，其核心是“防御性安全”。与私营军事公司主要为军队服务不同，私营安保公司主要为各类非军事组织提供安全服务。在现实操作中，两类公司的服务范围常常相互重叠、界限模糊，且其行为性质（进攻性或防御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情境下的任务授权与具体执行方式。在西方如《蒙特勒文件》中也使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PMSC）的概念。鉴于此，本文采纳一种更为宽泛的、功能性的定义方式，将“私营军事公司”视为一个涵盖性术语，用以指代所有在冲突或高风险地区受雇提供传统上由国家武装力量承担之军事与安保服务的私营化商业实体。

[5] P.W. 辛格：《企业武士：私营军事产业的兴起》，第11页。

[6] Laura Peterson, “Privatizing Combat,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October 28, 2002, <https://publicintegrity.org/national-security/making-a-killing/privatizing-combat-the-new-world-order/>.

超过 15 万名私营军事公司雇员为美国国防部提供服务^[1]。2003 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私人承包商数量超过了美国作战部队的数量，在印证私营军事公司重要性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政府开展军事和重建活动能力的质疑。^[2] 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和扩张持续至今，其重要性在乌克兰危机中再次显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冲突进程。在冲突中，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使用了私营军事公司，据估计参加战斗的私营军事公司人员约为 35000 人。^[3] 甚至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危机还导致了更多新的私营军事公司的成立。^[4] 所有这些都是私营军事公司在全球安全格局中不断崛起的重要体现。

当今世界，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博弈与以意识形态为底色的各领域竞争日益激烈，各种新旧问题与各类国家利益交织，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全球安全赤字日益加深。在此背景下，私营军事公司正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冲突动态的关键力量，对国家政策和全球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随着国家间冲突复杂性的增加，对私营军事公司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不少国家已开始重视其重要性并愿意为其服务付费。^[5] 然而，私营军事公司在为主权国家提供新的选择和能力的同时，也给传统的国家主权及其军事行动带来了诸多挑战。作为 21 世纪转包和私营化形式中的一种，私营军事公司改变了国际政治和战争的很多规则。^[6] 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复合危机时代”，私营军事公司既可能成为填补安全治理赤字的技

[1] Lindsey Cameron and Vincent Chetail, *Privatizing War: Private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mpanies under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

[2] T. Christian Miller, "IRAQ: Private Contractors Outnumber U.S. Troops in Iraq," CorpWatch, July 4, 2007, <https://www.corpwatch.org/article/iraq-private-contractors-outnumber-us-troops-iraq>.

[3] Han Bouwmeester, "Mercenary Armies in the Russo-Ukrainian War," Militaire Spectator, November 18, 2024, <https://militairespectator.nl/artikelen/mercenary-armies-russo-ukrainian-war>.

[4] Ryan Bauer and Erik E. Mueller, "Russian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Thriving Due to War with Ukraine," The Moscow Times, June 14, 2023,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3/06/14/russian-private-military-companies-thriving-due-to-war-with-ukraine-a81490>.

[5] James O C Jonah, "Foreword," in Simon Chesterman, and Chia Lehnardt eds., *From Mercenaries to Market: The Rise and Regulation of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vii.

[6] P.W. 辛格：《企业武士：私营军事产业的兴起》，第 10 页。

术方案，也可能异化为战争私营化的危险推手。

传统国际安全研究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分析单元，而私营军事公司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强势介入，既打破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家垄断暴力的根本准则，又对现实主义学派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构成挑战。在私营军事公司迅速崛起的背景下，深入研究私营军事公司崛起的动因、对全球安全格局带来的影响及发展前景，并尝试回应当前全球安全格局正在出现的“私营化”转型的核心命题，对于全球安全治理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私营军事公司崛起的多维逻辑

私营军事公司在全球安全格局中的崛起反映了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质变迁，这一进程深嵌于战争商业化与安全供给市场化的宏观趋势中，并对主权国家垄断暴力合法使用的共识带来深刻冲击。从本质上来说，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与国际安全局势、国家行为体的战略需求以及私营军事公司的组织形态进化有着重要关联。

（一）国际安全局势的调整与转型：大国战争的退潮与“灰色”战争的涌现

冷战结束后，大国战争退潮，推动当今世界史无前例地走向了一个“大国无战争时代”^[1]。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灰色地带”冲突的愈演愈烈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

“灰色地带”冲突取代大国战争成为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重要发展趋势。冷战结束以来，国家间因历史遗留问题和国家核心利益冲突而引发的小规模冲突持续存在，但重大武装冲突在全部冲突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2]，现代国家间冲突日益呈现小规模、多频次的特征。在乌克兰危机中，俄乌双方在各

[1] 杨原：《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外交评论》2011 年第 4 期，第 96-116 页。

[2] 唐永胜等：《冷战后全球武装冲突的特点及演变》，《现代国际关系》2008 年第 8 期，第 1-9 页。

自的军事行动中融合了传统战争和非传统战争的特点,包括信息战、网络战等。这种混合战争的形式体现了现代冲突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国家间的军事冲突不再是单一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而是包括了多种小规模、多频次、零碎化的战术和策略,这种战争形式可以通过其战略布局的分散性最大程度地减少伤亡和损失,同时也可以达到一定的作战效果。巴尔托什等人指出,非传统的“混合战争”中有非国家行为体的武装组织参与作战行动,包括国际恐怖组织、私营军事公司等。^[1] 私营军事公司为现代国家提供了一种灵活、专业且效率相对较高的军事力量使用方式,同时也为国家在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中提供了更多的战略选择。因此,私营军事公司的介入亦可被视为国家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寻求新的战略工具和手段的表现。

与国家间战争等传统安全风险相比,冷战后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近年来,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一系列新变化:对抗性加剧、冲突性上升、多样化特征更加明显,联动性、突发性、传导性空前。^[2] 2024年,全球恐怖主义事件虽然相较此前下降了22%,但恐怖主义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了22%,平均每起增加了56%,恐怖主义形势仍在恶化。^[3]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态势呈现日益严峻的趋势。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复杂性、隐蔽性、跨国性等特征及其在近年来呈现的专业化、组织化、技术化等发展态势为其治理增加了难度。国际社会治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需求日益迫切。在国家积极探索非传统安全威胁新治理模式的过程中,私营军事公司因其灵活性和专业性,能够在某些情况下提供传统国家力量难以提供的服务,进而填补国家治理失能留下的安全真空。

(二) 成本—收益驱动下国家行为体的主权妥协

全球化时代推动了国家海外利益的延伸与扩展,体现在对外贸易、对海

[1] A.A. 巴尔托什等:《混合战争战略和反战略》,《俄罗斯学刊》2020年第2期,第121-136页。

[2] 傅小强、韩立群:《非传统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趋势研究》,《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2期,第88-103页。

[3]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4,”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February 17, 2024, <https://www.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24/02/GTI-2024-web-290224.pdf>.

外关键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对战略通道使用权的获取等方面。海外利益的维护与扩展具有远超于国内环境的复杂性：国际态势复杂多变，各国际行为体在某一特定地域的利益错综相连，旨在维护本国海外利益的行为可能引发“蝴蝶效应”，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对海外利益的过度干预也可能僭越他国主权，在遭受国际社会谴责的同时，亦有引发战争的风险。在此背景下，国家亟需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非政府方式来捍卫自身海外利益。相较于传统军事力量，私营军事公司能够有效帮助国家延伸其在海外的影响，尤其是在传统军事力量难以介入或成本过高的地区。基于此，私营军事公司成为国家在保护自身海外战略资源、设施及政治联盟的关键力量。国家通常通过雇佣私营军事公司来避免直接军事干预，从而降低政治成本并灵活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

首先，私营军事公司成为主权国家规避战争责任与伤亡风险的“道德外包”策略。从责任规避的角度来看，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主题的共识早已深入人心。国家的对外军事行动，除非属于自卫性战争，往往会面临国际社会谴责、国家形象受损、国家间矛盾激化等问题，甚至存在被定性为战争罪的风险。巨大的道德成本使得国家行为体正在逐步减少对战争等军事手段的使用，但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安全挑战仍然存在。国家行为体在面对此类安全威胁和冲突时，通过雇佣私营军事公司执行海外军事行动，至少可以在形式上避免直接的海外军事干预，回避了国际法中关于“国家责任”的追溯，成为一种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替代方案。另外，从伤亡风险来看，私营军事公司作为非政府机构，其行动和伤亡不需要进行公开报道，政府无需承担政治后果。^[1] 因为雇佣私营军事公司造成的人员伤亡不会计入国家官方阵亡统计，统治者也因此避免了因为战争伤亡所遭受的道德谴责，免受因战争伤亡导致的民意反噬和反战情绪，将国家的战争代价“外包”给私营军事公司，这也为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冷战结束后的裁军浪潮以及军费缩减趋势，为各主权国家转向私

[1] 蔺陆洲：《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对国际安全的影响：起源、现状与未来》，《俄罗斯研究》2024年第2期，第169-196页。

营军事公司创造了时代背景。冷战结束后，高度军事化的国家经济与产业布局同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趋势相悖，由巨额军费支撑的大规模军力储备失去现实意义上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裁军与军费缩减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军事战略调整的重要方向，也为私营军事公司的发展创造了历史契机。21 世纪初，各国军队的士兵总数比 1989 年时减少了 700 多万，美国士兵裁减到冷战巅峰时期的 1/3，英国陆军的规模降到 200 年来的最低点。^[1] 在冷战后裁军浪潮的持续冲击下，全球安全格局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与供需错配：一方面，随着大规模裁军和军费缩减，传统军事领域正经历着人才、装备与技术的结构性流失，众多依附于军事化体系运作的机构与企业亦因订单锐减而陷入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冷战后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威胁有所缓解，尤其是大国间的战争退潮，但因恐怖主义、地区冲突、国际维和行动和海外利益保护等催生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需求却呈现显著增长态势。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顺应了当前全球安全格局的供需矛盾，成了弥合主权国家持续扩张的海外利益诉求与日趋紧张的军事投入之间鸿沟的关键载体。

最后，部分发展中国家存在治理能力不足与政府效能弱化等问题，这也是推动私营军事公司崛起的重要因素。在非洲、拉美等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国家机器因财政困难和军事资源匮乏难以有效履行维护安全与秩序的职能，时常面临着地方武装叛乱、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威胁。脆弱、不稳定、崩溃的国家面临着多种威胁，也为恐怖分子、有组织犯罪和其他非法团体提供了安全避难所。^[2] 此类国家的经济命脉往往高度依赖石油、矿产等战略资源开发，但其政府在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矿产开采区及战略运输通道等方面的能力又普遍薄弱，私营军事公司遂成为此类国家用来保护矿产资源开发和培训政府军队等的合作伙伴。在不少非洲国家，如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刚果（金）等，私营军事公司正与政府开展广泛合作。尤其是在效率和效能方面，（军事）私有化成为一种重大进步，其益处与过度集中的政府官僚机构的失败形成鲜

[1] P.W. 辛格：《企业武士：私营军事产业的兴起》，第 75 页。

[2] “Weak and Failing States: Evolving Security Threats and U.S. Policy,” U.S. CONGRESS, August 28, 2008,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L/RL34253/7>.

明对比。^[1] 私营军事公司通过与政府合作，为其提供安保服务、军事支持以及资源保护等，有效弥补了政府的能力缺口。例如，塞拉利昂饱受内战影响，大部分钻石矿厂多次因战争停产，一些被派往保护其生产的政府军队也纷纷叛逃，政府逐步失去对矿产资源的控制权。随后，塞拉利昂政府与南非的 EO 私营军事公司(Executive Outcomes)合作，建立了互惠互利的商业伙伴关系，有效地维护了当地矿石开采的秩序。^[2]

(三) 私营军事公司自身的组织形态进化

首先，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以市场为导向、资本为驱动的发展模式。私营军事公司的运作逻辑与国家主导的传统政府军事力量存在本质差异：后者以国家为主体、以政治目标为行动导向，而前者则以市场需求为核心驱动力、以经济收益为根本目标。私营军事公司的逐利性本质使其往往能够提供更具市场竞争力的安全服务方案。后冷战时期，全球安全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大规模国家军事力量逐渐向更加廉价、高效的安全服务需求转型。私营军事公司凭借对市场动态的敏锐捕捉能力和快速响应机制，逐步渗透进原本由国家军队主导的军事安全服务领域。当主权国家面临军费缩减与军事战略调整的双重压力时，私营军事公司通过提供定制化、目标明确且更具市场竞争力的军事与安保服务，满足了国家在多重情形下的军事安全需求。此外，私营军事公司是为了迎合市场而存在的，其服务效率更高，服务领域更广，从单一的战场作战到武装保卫、后勤支持、情报支援及战略咨询等，不断巩固其在国际安全市场中的地位。这种以资本为驱动的发展模式，使其与国家武装力量相比，更加灵活、更有能力、更具性价比，不仅强化了私营军事公司在行动过程中的独立性，也赋予其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战略价值，从而实现自身在全球安全格局中的迅速崛起。

[1] Christopher Kinsey, *Corporate Soldier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Rise of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3.

[2] Marika Josephides, "How Private Military Services Saved Sierra Leone: The Contracting Out of Military Duties Came from Necessity But Help Ensure Long-lasting Security," In *On Africa*, December 1, 2014, <https://www.inonafrica.com/2014/12/01/how-private-military-services-saved-sierra-leone-the-contracting-out-of-military-duties-came-from-necessity-but-help-ensure-long-lasting-security/>.

其次，灵活的作战管理模式与广泛的地缘布局也为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提供了保障。种种现象表明，私营军事公司已具备与国家军队相当，甚至在特定时候优于一些国家军队的作战与管理模式。许多私营军事公司采用模块化运营模式，根据合同要求灵活组建作战小组、安保团队或后勤支持单位，从而在低成本条件下高效率完成任务。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高风险地区中，相较于国家军队普遍存在的编制复杂、决策缓慢、响应滞后和作战规则严格等问题，私营军事公司以其精简高效的管理架构和任务导向的运作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内根据需求快速调整资源和部署任务团队，迅速组建任务小组或调整策略，适应复杂多变的冲突环境。

私营军事公司在地缘布局上的广泛分布是其又一特征。非洲、中东和南美等地区常因政治动荡和资源争夺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存在大量安全需求。与之相应，这些地区也分布着大量私营军事公司，它们是获取当地资源控制权、武装保护等军事服务的重要供给单位。私营军事公司凭借其非国家行为体的身份与广泛的地缘布局，在国家军队难以介入或干预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为这些地区提供安保和军事支持。当前诸多私营军事公司已将自身的服务范围拓展至全球，同时与其他私营军事公司、地方政府、区域势力相互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编织起一张第三方军事服务的商业化合作网络。以瓦格纳集团为例，该组织是一家实体位于俄罗斯境内的私营军事公司，规模巨大，活动网络遍及世界各地，东欧、中东、非洲地区都有该公司的身影。

最后，国际法监管的空白也为私营军事公司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法律环境。私营军事公司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国际社会在私营军事公司运营的法律规制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空白。对私营军事公司可能提供的服务进行国内或国际监管方面的法律，以及它们为了获准经营所必须遵守的行政程序非常有限^[1]，这种身份界定与行为约束的法律空白客观上为私营军事公司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空间。私营军事公司以合法商业实体的形式运作，

[1] Emanuela-Chiara Gillard, "Business Goes to War: Private Military/Security Companie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863, No.88, 2006, pp.525-572.

其雇员不完全符合传统“雇佣兵”的定义，常常游走于现行法律框架的边缘。国际法中虽有部分条款涉及武装冲突中的雇佣兵行为，但此类条款或是对私营军事公司类行为体的定义过于宽泛，或是相关条款过于狭窄，无法适用于私营军事公司现代化、多样化的业务模式。这种法律真空为私营军事公司开展业务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私营军事公司甚至可以直接以“安全咨询”或“风险管理”的名义介入军事冲突和政治事务，而不必受到当地政府或国际社会的过度干涉。宽松的法律环境降低了私营军事公司进入市场的门槛，为其规避法律责任提供了空间，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私营军事公司的发展。

二、私营军事公司崛起的正面效应

当前，私营军事公司正凭借其灵活的管理方式、多样化的服务能力、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以及与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广泛合作，在应对安全威胁中展现出显著优势，已被一些西方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包括联合国）聘用，^[1] 并给全球安全格局带来了直接影响。私营军事公司可以作为赋能国家军事能力与弹性安全供给的角色。

（一）补充国家军事力量，推动国家海外利益保护与延展

全球化时代，国家海外利益呈现多元化、分散化与高风险化的特征，但传统国家军事力量的部署往往受限于国际法约束、外交敏感性以及高昂的运作成本，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保护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私营军事公司能够通过其灵活的部署机制、专业的军事能力、非国家化的身份及商业化的运作模式等，执行高风险区域的武装护卫、战略资产保护、撤侨行动支援等任务，既避免了直接动用国家军队可能引发的外交争议，又确保了国家利益相关人员与资产的安全。例如，2016年南苏丹内战爆发后当地局势混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驻南苏丹员工身处险境，德威安保（DeWe

[1] Oldrich Bures,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A Second Best Peacekeeping Optio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12, No.4, 2005, pp.533-546.

Security) 作为私营军事公司受雇承担了救援任务, 依托当地资源, 最终成功将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1] 另据华信中安集团官网显示, 其提供的海上武装护航于 2012 年 3 月至 2021 年 12 月, 为中外船舶提供了 7600 多次护航服务, 护卫和培训船员约 17 万人次, 期间共驱离海盗骚扰 190 余次, 开枪击退海盗袭击 120 余次。^[2] 此外, 私营军事公司还可作为国家军事力量的“前哨”, 以商业合作形式进入敏感地区, 为后续国家力量的介入积累行动经验。总之, 私营军事公司的存在与活动是对传统国家军事力量的有力补充, 可以形成优势互补与战略协同, 在保护国家战略利益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 提升军队运作效率, 助推军用科技创新

私营军事公司作为军事领域的专业化服务提供者, 直接面向市场的特性使其具备更加高效的运营模式与技术创新应用能力。一方面, 私营军事公司通过与政府军队合作, 凭借其高度灵活的组织结构、专业化的人员配置与市场化的运作机制, 承接军队部分非核心但至关重要的功能, 如后勤保障、装备维修、情报支援等任务, 能够为军队提供精准高效的辅助支持。这有助于提升军队运转效率, 优化传统政府军事力量的职能, 使其更加集中精力于核心战斗力建设, 也能够通过其市场特性加速政府军队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以后勤服务为例, 后勤服务是军队运转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但传统军队后勤模式成本高昂且响应速度缓慢, 私营军事公司介入后, 凭借其市场化运作机制推动军队后勤服务朝低成本和高效率的方向转变。在伊拉克战争中, 美国国防部将大量的军事服务外包给黑水国际、阿卡德米等私营军事公司, 利用它们在后勤保障、人员保护、街道巡逻、翻译、情报获取与分析等领域的专业化水平, 辅助美军提升作战效率, 同时降低战争的人力成本。^[3] 另一方面, 私营军事公司的存在本身及其积极参与全球军事市场的竞争, 也在一定程度

[1] Charles Clover, “Chinese Private Security Companies Go Global,” February 26,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2a1ce1c8-fa7c-11e6-9516-2d969e0d3b65>.

[2] 《海上武装护航》, 华信中安集团, <https://www.hxza.com/cmscontent/540.html>.

[3] 文少彪、王佳霖:《美国中东代理人战争的复合化趋势》,《国际展望》2023 年第 5 期, 第 118-139 页。

上对传统政府主导的军事力量运作效率提出了挑战，市场竞争的结果将使传统政府军事力量不得不考虑如何进一步提升效率以增强自身竞争力。

同时，私营军事公司在推动军事技术创新应用方面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私营军事公司的存在依赖于其任务完成能力，而这离不开现代化军用技术创新及其应用。作为直接面向全球军事市场的非政府实体，私营军事公司在市场竞争机制与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有着强烈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动力。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开始后，私营军事公司正在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无人系统、网络空间等前沿科技领域，能够提供从无人机作业到网络防御等尖端服务，而且开发出适应现代战争形态的新型装备与方案，使其在未来的军事战略中重要性日益提升。^[1] 例如，黑水国际等私营军事公司部署无人机在冲突地区收集情报，显著提高了态势感知能力；G4S 使用配备先进通信系统和监控技术的装甲车在高风险环境中保护人员和资产。^[2] 2025 年 3 月，美国私营军事公司 Erik Prince 协助海地政府部署由简易炸药改装的商业无人机开展打击犯罪活动，造成 300 名帮派成员死亡。^[3] 私营军事公司的技术创新应用能力不仅增强了自身在全球军事市场的竞争力，而且通过参与竞争启发了传统政府主导的军事力量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加速军事现代化进程。

（三）为主权国家以外的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提供安全保障力量

私营军事公司不仅为国家提供服务，也为包括跨国公司、全球和区域性政府间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在内的其他行为体提供服务，通常是在存在武装冲突的地区^[4]。目前，私营军事公司已经为联合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1] Muhammad Hamdan, "The Shadow Army: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and Their Impact on Modern Defense Policy," October 21, 2024,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4/10/21/the-shadow-army-private-military-companies-and-their-impact-on-modern-defense-policy/>.

[2] Total Military Insight, "Navigating PMCs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Trends and Impacts," 2024, <https://totalmilitaryinsight.com/pmcs-in-the-age-of-technology/>.

[3] Demian Bio, "Haitian Forces Reportedly Killing Hundreds of Gang Members With Drones," The Latin Times, June 26, 2025, <https://www.latintimes.com/haitian-forces-reportedly-killing-hundreds-gang-members-drones-585658>.

[4] Emanuela-Chiara Gillard, "Business Goes to War: Private Military/Security Companie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pp.525-572.

等国际组织在高风险地区执行任务提供了必要的安全保障。以联合国为例，2014年5月，联合国通过《第2155号决议》，安理会决定南苏丹特派团除由12300名维和官兵以及1323名警察组成外，还将部分安保工作外包给一家注册地在南非的私营安保公司。^[1] 联合国工作人员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联合国在诸多任务中使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包括守卫办公场所和保护车队、进行风险评估、安保训练、物流支持和排雷任务等。^[2]

除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外，跨国公司也是私营军事公司崛起的受益者。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为获取稀缺战略资产与开拓新兴市场，而不得不冒险深入政治环境动荡、安全局势脆弱的地区开展业务，因为非洲、拉美等地区蕴藏大量钻石、黄金、关键矿产、石油等资源。不过这些地区因民族宗教矛盾、治理能力不足等时常处于冲突之中，难以向外国投资者提供可靠的安全保护，私营军事公司的存在恰好能够为此类跨国企业应对冲突风险保驾护航。^[3] 例如，由于寻求政府军队提供安全保障的流程较为繁琐，且可能承担一定国际舆论压力，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在1992年同英国私营军事公司“防卫科学实验室”（Defense Science Laboratory）签署合同，委托后者在哥伦比亚部署军事雇员，保护英国石油公司在当地的石油设施和人员安全。^[4]

三、私营军事公司崛起带来的挑战

私营军事公司在全球安全格局中的崛起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影响的反

[1] 刘波：《“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构建中的私营安保公司研究》，《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5期，第132页。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女士在利用雇佣军问题工作组组织的联合国使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问题小组讨论上的开幕致辞》，联合国网站，2014年3月5日，<https://www.ohchr.org/zh/statements/2014/03/opening-remarks-ms-navi-pillay-united-nations-high-commissioner-human-rights>。

[3] 何浩：《冷战后私营军事公司的兴起及其影响》，《国际研究参考》2017年第2期，第21-25页。

[4] 王晋、唐继安：《俄罗斯“混合战争”中的私营安保公司》，《俄罗斯学刊》2023年第3期，第64-80页。

思和批判。作为对全球安全需求日益扩张和国家军事能力局限性的市场化响应，私营军事公司既为全球安全治理带来新的可能性，也因其活动的复杂性和法律监管的薄弱性，给国际和平与安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尤其是其暗含的武力市场化趋势给国际体系带来深层危机。

（一）安全供给的私营化对全球安全格局造成范式性冲击

私营军事公司在本质上是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公共产品私有化的产物。伴随着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与扩张，安全正在经历逐渐被商品化的过程，它不再被视为完全由国家垄断提供，而是可以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在这个市场中，国家只是许多潜在的供应商之一，且不一定是最有效和最可靠的供应商。^[1]私营军事公司逐步将安全这一公共物品资本化、私有化，并以市场化机制解构传统国家军事垄断，打造安全服务的供给市场。这种安全外包化趋势改变了国家间军事合作的逻辑，对全球安全格局形成了范式性冲击。

一方面，安全承诺的可逆性动摇了传统联盟体系的稳定性。主权国家在长期的交往中往往倾向于依托协议构建联盟体系以获取安全。在私营军事公司成为主权国家可选方案的背景下，构建或加入传统联盟体系这一高成本、低自由的方式不再是获取安全的唯一路径，与之相比，私营军事公司能够以更灵活、低成本的方式提供“定制化安全服务”。这种以市场机制而非国家间信任驱动的安全竞争使得联盟内的国家间承诺成为可随时撤销的商品，单个国家通过私营军事公司获取安全的同时亦削弱了国家间安全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私营军事公司的商业模式对国家安全的介入，打破了传统国家安全作为“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逻辑，重塑了国家、公民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和责任分配，促使其朝向“市场逻辑”转变。私营军事公司作为私营企业，其运作模式符合奥尔森强调的“小集团优势”：私营军事公司通过合同明确责任与报酬，规避了大集团的协调难题；通过市场化手段吸引精英人才，以选择性激励打造高效行动小组。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从“公共物品”向“私

[1] Rita Abrahamsen and Michael C. Williams, "Security Privatization and Global Security Assemblages,"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18, No.1, 2011, pp.173-174.

有化服务”转变，全球安全供给体系将不可逆转地滑向一种高度资本化的模式——安全资源的分配不再取决于国际道义或战略必要性，而是纯粹遵循资本回报率原则。

（二）暴力的伦理枷锁将被资本的逻辑打破并带来国际体系危机

私营军事公司作为一种“战争工具”，正在重构现代冲突的底层逻辑，推动战争形态向“混合性”与“模糊性”的范式跃迁。这一进程的本质是主权国家通过市场化手段将暴力实施权从政府军队体系中剥离，形成“模糊性介入”的战略优势。私营军事公司与主权国家的合作通过商业合同展开，但这种雇佣合同往往经过多层转包。例如，某私营军事公司于A国注册，商业合同由位于B国的中介公司承接并使用国籍为C国的士兵在D国开展军事行动。私营军事公司这种跨国式的合同承接方式极易引起责任链断裂，导致相关法律无法追溯责任主体。这一现象使得《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条约或法规中的“指挥官责任”^[1]等基础性定义由于主体难以判断、过程难以追溯等困境而失去实践基础，降低了国家发动军事行动的政治风险。因此，私营军事公司的运作模式为其雇主国在军事冲突中创造了一种新型“灰色地带”——冲突的发起者、实施者与责任者被精心设计的法人结构分离，传统国际法中的国家责任等概念陷入解释困境。

私营军事公司在法律条文中的模糊性加之其逐利本质，正在对传统战争伦理框架构成结构性冲击，其引发的道德困境动摇着人类数百年构建的战争文明规范。首先是正义战争理论的权威性瓦解。该理论认为：合法或胜任的权威、正义的起因、正当的意图、意图的宣告、最后手段、成功的合理希望共同构成了“开战正义”，^[2]但私营军事公司的运作机制彻底颠覆了这一逻辑。

[1] 指挥官责任（command responsibility）是国际法中的一项法理原则，即允许对下属实施的战争罪行追究军事指挥官的责任。这意味着指挥官在某种程度上应对其下属的行为负责，且有明确的责任在其权力范围内采取适当措施，以保护战俘和平民居民免受违反战争法行为的侵害。参见“Command Responsibility,” Cornell Law School,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command_responsibility.

[2] James F. Childress, “Just-war Theories: The Bases, Interrelations, Priorities, and Functions of Their Criteria,” *Theological Studies*, Vol.39, No.3, 1978, pp.427-445.

辑。从本质上看，私营军事公司开展的军事行动是由资本增殖需求驱动的暴力行为，无关正义战争理论强调的“开战正义”。资本化与市场化的成熟发展使得对战争正义性的评估被资本回报率等指标挤压，传统军事伦理学的正当性框架在私营军事公司的逐利性面前基本无效。其次是不对称武力的使用。私营军事公司通过技术创新与成本控制，其发起军事行动中使用武力的成本远低于政府官方，且无需遵守军方复杂的交战规则审查程序，进而在其选择行动模式中倾向于以效率而非手段—目标相称性作为首要考量指标。例如，2007 年，美国黑水公司雇佣的 4 名保安在巴格达纳苏尔广场射杀平民，造成 14 名手无寸铁的平民死亡，至少 17 人受伤。^[1] 该事件凸显了私营军事公司不惜滥用暴力以确保任务效率的核心运营原则，其对暴力的使用已经超出了实现目标所需的必要限度，这背后正是资本效率逻辑对军事手段必要性的僭越。最后是战士身份的伦理异化。传统意义上战斗人员的身份建立在国家义务与荣誉准则基础上，而私营军事公司雇佣兵的“契约战士”身份解构了这一伦理根基。这种将暴力行为商品化的激励机制把战士的身份义务与道德责任简化为劳动合同中的绩效条款，势必催生出扭曲的战场行为模式。可以预见，资本因素注入战争所引起的战争伦理失效将导致连锁反应，如果战争彻底沦为明码标价的金融衍生品，人类数千年来试图为暴力套上的伦理枷锁将被彻底碾碎。

（三）国家的暴力垄断权被解构引发国家权威的“空心化”

私营军事公司对国家军事能力的渗透甚至替代，可能引发国家权威的“空心化”进程。质言之，私营军事公司使国家暴力垄断权面临被市场异化的风险。首先，军事职能外包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国家将军事情报、后勤保障等核心职能外包给私营军事公司后，短期内降低了其组织成本，但同时也导致了国家军事能力的去权威化。情报分析、战术通信等知识密集型职能被私营军事公司承包的同时，军队内部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部分自主性。外包规模越大，

[1] 《世界周刊 | 揭秘美国私人军事公司》，光明网，2024 年 8 月 26 日，https://world.gmw.cn/2024-08/26/content_37523086.htm。

重建内部能力的边际成本越高,最终可能形成“没有私营军事公司就无法作战”的外部依赖困境。其次,忠诚度稀释效应对国家主权的权威性构成威胁。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的存在,在于被支配者必须顺从支配者声称具有的权威”^[1],即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建立在“权威一服从”的垂直契约基础上。然而,私营军事公司引入的平行权力结构使其士兵陷入了一种效忠困境:国家军事力量越是依赖外部资本维持,其权威的正当性越是遭受质疑,最终加剧“金主与祖国究竟应该效忠于谁”的疑问,导致“主权保卫者”沦为“资本雇佣军”的身份颠覆。最后,一次性的作战合同可能导致战略文化断层,形成军事知识传承的系统性危机。作战经验的代际传递依赖于军队编制的相对稳定性,但私营军事公司以临时的外包军事行动替代军队长期稳定的训练体系,失去在真实冲突中检验与修正战略文化的实践场域,不仅弱化了战术创新能力,更导致军队对战争中突发情况应对能力的退化。

毫无疑问,私营军事公司对军队功能的部分取代使得资本渐进解构主权要素,侵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主权是一种以国家为范围的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权力。^[2]但在私营军事公司的运作过程中,国家领土等主权象征物被切割为由资本介入甚至被资本控制的模块,传统主权的不可分割原则被不断瓦解。此外,私营军事公司以私营暴力资本控制弱政府国家的矿产运输通道等资源,继而收买官僚体系、渗透立法机构,最终甚至可能完成从安全承包商到平行政府的质变。这种“反向国家化”的进程表明,暴力垄断权被市场化分解后,国家不再是战争的产物,反而成为战争的客体,进而导致主权国家的自主性面临系统性危机。进而,多层次、重叠的权威结构将取代单一国家主权,使全球秩序进入“后威斯特伐利亚”混沌期。

[1]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2] 王沪宁:《国家主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四、私营军事公司的发展前景

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折射出后冷战时代暴力垄断权从主权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的让渡，标志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遭遇资本全球化与安全私有化的双重解构。作为兼具军事效能与市场理性的新型安全供给者，私营军事公司将暴力转化为可供交易的商品，引发了对主权国家与跨国资本在军事领域的权力再平衡的广泛关注。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深嵌于以下逻辑中：安全公共品私有化引发的治理悖论，军事行动市场化导向对传统战略文化的侵蚀，以及暴力商品化对国家主体性假设的根本质疑。展望未来，私营军事公司将作为一支独立的变量继续影响全球安全生态与军事权力流变。

（一）私营军事公司成为全球安全格局中的刚性需求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 2024 年年鉴指出：“（全球和平行动）冲突管理中日益增多地使用私人军事和安保公司，以及采取临时性或双边行动，作为多边和平行动的替代方案，表明冲突管理正趋于碎片化；近年来，武装冲突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私人军事和安保公司的全球快速增长。”^[1] 未来，助推私营军事公司继续扩张的动力将持续存在。首先，在国家层面，弱政府国家的战略能力建设需求将长期存在。非洲、拉美等部分国家政府的社会控制力弱，且国家军队基础差、建设周期长，通过与私营军事公司合作以自然资源、货币等换取军事服务的合同式合作仍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作为此类国家获得“安全”公共物品的重要渠道存在。其次，在非国家行为体层面，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维和行动等需要武装力量的国际行动中依然面临制度性困境，相关行动囿于其身份界定、意识形态、国际法规等诸多限制，往往难以取得实际成效，私营军事公司以经济收益为目的的运作模式等特性能够巧妙规避这些限制，以低风险、小成本、高效率的形式服务于非国家行为体。再次，在战争形式层面，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迭起，技术革命正在推

[1] “SIPRI Yearbook 2024,” SIPRI, June 17, 2024, <https://www.sipri.org/yearbook/2024>.

动军事专业化分工，私营军事公司顺应了军事专业化的发展趋势。美国《2022年国防战略报告》指出将进一步加强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以利用其技术优势和创新精神。^[1] 私营军事公司正在利用这一机遇，将自身嵌入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的系统之中，成为国家安全治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技术模块，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发挥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最后，在全球安全格局层面，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地缘政治回归的暗流涌动之间的结构性裂隙不会在短期内消解，以主权国家为发起者的武装行为将面临对外形象受损、国家信誉下滑、国际制度制裁等风险，但国家海外利益的不断延伸与历史性冲突的持续存在决定了全球安全格局中难以出现完全意义上的和平，私营军事公司将凭借其组织与活动模式巧妙成为国家间战争与国际法规的“飞地”，成为地缘冲突中的代理人角色。

（二）新一轮科技革命重构私营军事公司竞争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在以前所未有的磅礴之力重塑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对私营军事公司的竞争力结构进行重构，其影响将层层扩散，深度渗透至全球安全格局的结构和框架之中。从新技术的发展态势看，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自主系统、大数据和网络技术的私营军事公司有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获得更强竞争力。人工智能、无人机、大数据等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驱动力，相较于洲际导弹、飞机发动机等被国家军事力量垄断的尖端技术，更容易被私营军事公司在内的各行为体获得并使用，并直接影响着私营军事公司作战能力的智能化与决策效能的精准化。这些技术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至私营军事公司的同时，亦重塑了传统的军事能力体系架构，以往国家军事力量相较于私营军事公司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被新一轮科技革命削弱，使得私营军事公司有望从单一的战斗人员供给商转变为更优安全方案的供给者。然而，这一趋势也伴随着严峻挑战，包括自主杀伤性武器的伦理与法律困境、先进军事技术扩散对全球战略稳定的潜在冲击，进而

[1]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ctober 27, 2022,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Oct/27/2003103845/-1/-1/1/2022-NATIONAL-DEFENSE-STRATEGY-NPR-MDR.PDF>.

催生对私营军事公司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进行更严格监管的迫切需求。

（三）资本逻辑对国家产生反噬并引发对私营军事公司的警惕

私营军事公司的资本化运作模式在提升其相较于军队的竞争力的同时，其商业中立性也可能对雇主国形成反噬，将忠诚于祖国的军事伦理演变为道德相对主义的温床，孕育着动摇其存在根基的风险。

一方面，私营军事公司雇员对商业契约的忠诚与雇主国国家安全之间形成结构性矛盾。当前，至少有 90 家私营军事公司在全球 110 个国家 / 地区开展业务，这些公司中的大多数总部位于美国、英国和南非，绝大部分服务向非洲、南美洲和亚洲的冲突国家提供。^[1] 此类私营军事公司在承接国家军事合同的同时，也掌握了雇主国的战术数据、作战模式与情报资源等信息。未来，伴随着私营军事公司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及其竞争的激烈化，其逐利本性可能导致相关信息形成“安全黑市”，以信息换利润的商业策略一旦运转，将构成对国家主权的进一步僭越。商业化运作模式下的私营军事公司缺少对雇主除资本之外的忠诚，在为了利润向雇主提供安全服务的同时，亦有可能为了利润而出卖雇主，为全球安全治理带来隐患。

另一方面，部分私营军事公司失控滋生主权侵蚀、社会动乱等问题，导致政治风险积累，影响其合法性与吸引力。例如，瓦格纳集团通过与俄罗斯政府的合作获得认可，并被视为合法行为者，俄罗斯政府一度尝试将瓦格纳集团纳入官方安全结构。^[2] 然而，瓦格纳集团创始者、领导人普里戈津与俄罗斯国防部长期不合，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多次谴责俄罗斯国防部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无能。^[3] 瓦格纳集团与俄罗斯国防部的权力斗争、普里戈津的个人野心及其对俄罗斯政府政策不满，导致该私营军事公司与政府间的矛盾逐渐放

[1] Laura Peterson, "Privatizing Combat, The New World Order."

[2] Karen Philippa Larse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agner Group," DIIS, January 9, 2025, <https://www.diis.dk/en/research/the-rise-and-fall-of-the-wagner-group>.

[3] Phil Helsel, "What is the Wagner Group? A Look at the Mercenary Group Led by Man Accused of 'Armed Mutiny' in Russia," NBC News, June 24, 2023,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what-is-the-wagner-group-rcna90923>.

大。2023年6月，普里戈津发起一场名为“正义游行”的行动，命令其雇员从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前往莫斯科郊区。^[1] 此次事件在严重危害俄罗斯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引发了国家行为体对私营军事公司的恐慌：私营军事公司所提供的军事服务并不是简单的商品与资本间的互换关系，作为具有独立军事行动能力的国际社会行为体，私营军事公司野心的扩张也有可能对国家政权稳定性构成严峻威胁。

（四）针对私营军事公司的规范建构与制度约束将陆续开展

在全球安全格局的演进过程中，私营军事公司的作用日益凸显，其发展走向也愈发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全球安全形势的复杂化以及各国安全需求的多样化，私营军事公司将逐步走出以往的“灰色地带”，迎来规范建构与制度约束的新阶段。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形成针对私营军事安保行业的国际治理体系雏形，它以西方牵头的软法性文件为主要形式，以提升国家层面的监管和规制水平为目的和依托，目前暂以行业性的规范和自律为主要手段。^[2] 以俄罗斯为例，出于政府意愿和现实需求，俄罗斯从2014年起逐步注重对私营军事公司的立法管制，目前通过对国内法的修补，采取行政许可的方式，逐步确立私营军事公司的合法地位。^[3] 在此进程中，瓦格纳集团的法律地位得到了俄罗斯官方的承认，从秘密运行转为公开活动，瓦格纳集团注册了实体法人公司并在圣彼得堡设立了总部，在极右翼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成为俄罗斯的重要政治力量。^[4] 私营军事公司的地位合法化进程呈现显著的“实践先于规范”特征，其在现实行动中对制度的突破不断涌现，相关制度

[1] Jack Watling, “Wagner’s March on Moscow Left Unresolved Challenges in Its Wake,” RUSI, June 26, 2023, <https://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wagners-march-moscow-left-unresolved-challenges-its-wake>.

[2] 李廷康：《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国际法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75页。

[3] 白峻楠、孟含笑：《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行业法律体系》，《国际研究参考》2021年第3期，第29-36页。

[4] 蔺陆洲：《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对国际安全的影响：起源、现状与未来》，第169-196页。

伴随着私营军事公司在全球安全格局中的具体行动而不断完善。

可以预见，未来伴随着私营军事公司活动范围、领域的逐步扩展，有关私营军事公司的法律文本也将快速涌现。一方面，从身份界定来看，明确私营军事公司的性质与范畴已成为当务之急。长久以来，私营军事公司游离于传统军事力量与商业组织之间，其身份的模糊性既为其带来了灵活运作的空间，也为其与主权国家的合作以及国际法规的规制带来了诸多障碍。通过立法与国际协议等形式对私营军事公司的身份进行精准界定已迫在眉睫，明确其作为特殊军事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不仅有助于维护当下作为联合国宪章根本的国家主权的排他性，也能为国际社会建立更具针对性的监管框架提供基础依据，确保其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参与更加有序、透明，降低其成为“法外实体”或地缘政治博弈工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行为规范方面，国际法层面的约束也必将加强。由于大部分私营军事公司在海外开展军事行动，其活动范围往往跨越多个司法管辖区，其行动的跨国性特征对现有国际法规则提出了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一套具有广泛共识和约束性的行为准则，以涵盖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作战手段与方法的相称性、对平民及战俘的人道主义保护标准等维度，以规制私营军事公司参与国际安全事务。针对私营军事公司的国际法约束，既是对其全球安全市场合法参与者的角色承认，也是推动私营军事公司从“影子力量”向“合法参与者”转型的关键。

五、结语

从乌克兰危机中的战斗支援到非洲地区的维和行动，私营军事公司正凭借其灵活性、专业性与市场化的运作模式，逐渐深嵌于国家战略与国际安全体系的缝隙之中，崛起成为全球安全格局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私营军事公司的崛起给全球安全格局带来双重效应。从正面来看，通过提供精准的安保服务、高效的资源整合能力以及技术驱动的作战模式，私营军事公司

可以作为补充国家军事力量、推动国家海外利益保护与延展的替代性力量；能够为主权国家以外的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提供安全保障力量；也有助于提升军队运转效率，助推军用科技创新。然而，私营军事公司的存在和崛起也给全球安全格局带来了范式性冲击：解构传统国家的军事垄断，消融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形成的国家主体性权威。更值得警惕的是，私营军事公司可能成为大国地缘政治扩张的工具——通过间接介入他国内政或冲突，既规避了国际舆论压力，又实现了战略扩张，最终导致主权概念的弱化与冲突的代理人化。

展望未来，私营军事公司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与安全治理体系的变革紧密交织。如何在国际法与现行主权框架下赋予私营军事公司以活动空间，并平衡其商业利益与伦理责任，已成为当下全球安全治理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治理倡议为规范和引导私营军事公司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前者所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有助于超越私营军事公司由资本驱动的行为逻辑，为构建一个包容、有效的监管框架奠定伦理基础，助推其作为国际社会多元行为体之一服务于全球安全治理大局；后者强调的“坚持主权平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多边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力求实效”的核心理念，则指向了以主权为红线，通过加强国际多边合作与对话，共同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与标准，以主权、国际法治、多边主义等为原则和规范框架，推动私营军事公司的治理真正释放全球安全治理效能。

【责任编辑：宁团辉】